

和谐语境下知识精英的角色重构

庞虎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知识精英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又不是万能的。长期以来,由于过分迷恋于政治情结、启蒙心态和终极关怀,使知识精英出现了严重的角色扭曲。新时期,知识精英应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应在创建多元文化、维系和谐关系、促进机制创新等方面有所建树,力争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实现自身价值。

关键词:和谐;知识精英;角色

中图分类号:C912/D6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5-0084-05

知识精英作为社会发展的独特力量,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精英政治”、“精英教育”、“精英化世纪”等新潮口号也应运而生。目前,我国已进入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各方面力量的协调整合。因此,新形势下,如何摆正精英的位置,协调精英与民众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精英”一词在学术上得以推广是和西方“精英主义”理论分不开的。西方精英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共和国》和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真正的创立者则是意大利社会学家G·莫斯卡和V·帕累托,之后又涌现出米尔斯、吉登斯、丹尼尔·贝尔、米歇尔斯等一大批社会学家,他们从各自立场和角度出发,结合时代的变革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精英主义的内涵,使这一理论趋于成熟。精英主义者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出发,肯定了权力领域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现象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进而提出了“精英”与“民众”的划分。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就曾把社会群体明确分为两个阶层:一是低级阶层,或称下层,指普通民众;二是高级阶层,或称上层,指社会精英。精英又分为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整个社会就是精英不断更新和循环的过程,“新的精英产生于社会的较低阶层,升为更高阶层,在这里登峰造极,然后,趋向堕落,被消

灭或消失”,“与这一精英循环过程相适应的就是社会状况的缓慢转变和改良”^{[1]137}。拉斯韦尔进一步指出:“社会分为精英与大众是普遍的,即便是在民主社会也是如此”,“少数人掌大权,而多数人则拥有的权力相对就小得多了”^[2]。显然,这是就社会政治角度的总体划分而言的。随着对文化、信息、技术等知识资源的拥有差距拉大,知识精英也就应运而生,并逐渐取得统治地位。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工业化社会的到来使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无声的革命”,“统治权大部分掌握在技术——知识中坚集团手里”“如果说过去百年间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物一直是企业家、商人和工业经理人员,那么,‘新的人物’就是掌握新的智力技术的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3]397}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进一步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认为“大传统”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属于知识精英的;而“小传统”是社会的支流文化,属于普通民众的^{[4]41}。

在我国,精英与民众的划分由来已久。古代传统意义的精英仅仅由官僚、士绅、地主等角色构成,随着时代的发展,精英的外延也不断扩大,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行各业的精英层出不穷,相关的研究也逐步展开。但目前对精英的研究还主要局限在社会、政治角度。就文化层面而言,精英与民众的划分还没有形成较为科学的界定。我国的学

* 收稿日期:2007-05-28

作者简介:庞虎(1978-),男,山东茌平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

者一般把那些文化水平较高、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人们称为“精英”，“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5]126}。而把那些文化水平较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人们称为“民众”，主要包括“一、乡村的农夫、农妇……二、城市里的工人、店伙、佣仆……三、高等小学高年级学生，商店或公司的办事人……”^{[6]26}。但是，这种仅仅以地位或者职业为标准的划分未免显得过于泛化，抹杀了在社会贡献中的个体差异性。

笔者认为，文化视野下的知识精英和民众的界定应当把文化水准与社会评价联系起来综合衡量。所以，这里我们所说的“精英”应该是主要指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并且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突出贡献的人们。“民众”主要是指不以知识技能为专业，没有卓越的业绩，特别是没有直接推动文化进步的人们。值得一提的是，精英与民众的二元划分是完全必要的，能使我们辨清二者的差别，有利于从定性的角度分别探究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轨迹，特别是有利于进一步探讨知识精英在这一轨迹中的特殊地位。应当看到，自古以来历代知识精英确实为文化的建构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功绩。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担负着社会教化的使命，起着引领社会发展潮流，推动社会伟大变革的中流砥柱作用。毋庸置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必然性只有通过杰出人物的偶然性才能得以科学的体现。没有精英或许历史仍然前进，“但是第一，这会大大延缓文明的进步，而第二，未必可能产生这种天才的思想所产生的完全同样的结果”^{[7]254}。

一

然而，精英又绝不是万能的。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伴随着历史变革，知识精英的职能曾经得以极大的升华，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知识精英的角色定位出现了严重扭曲，甚至一度陷入迷茫。主要表现在：

（一）政治情结的纠葛

中国的知识精英与传统士大夫一脉相承，他们身兼两任，既是文化价值的维系者，同时又是政治规范的辩护者。他们信奉“内圣外王”之道，力图经由“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跻身于统治阶层，达成“文化”与“政治”两大理想的重合。事实上，鱼和熊掌很难兼得。特别是近代随着外敌入侵，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面对形势的变

化，知识精英们逐渐陷入了困惑和焦虑：一方面，作为知识精英，想安身立命，必须潜心于文化研究，做到“独善其身”；另一方面，作为民族成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又必须忖度“兼济天下”的现实意义。但因自身的弱小又总是顾此失彼。“五四”运动以前，精英们尚能立足文化建设，以文化启蒙相号召，力图以文化的重构换取民族的振兴。但是“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政治危机的加剧，精英们的探索重心也发生转移，从开始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文学救国，到后来逐渐变为只有政治才能救国，使文化使命开始让位于政治责任。即使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有过关于“中西综合”的新文化的提倡，但为了团结救亡的需要，不得不放弃了知识精英本应具有批判精神，甚至向提倡“四维八德”的“新生活运动”妥协。并且知识精英们自身也随之迷失了自我定位，全都成了专业或者业余的政治家。应当承认，文化精英们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的确令人感动，但是如果将文化完全让位于政治，把文化仅仅看作政治的工具，实在不利于正常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和谐。没有文化背景的政治参与也只能是毫无辨别的盲从，对政治、对文化都没有太大益处。

（二）启蒙心态的束缚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总是具有“为天下师”的传统心态，他们以文化的独特优势，充当着社会启蒙者的角色，以此来体现自我的价值。就其精神而言，应当承认真诚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可贵的。然而在近代中国，想当精英的人太多，而真正的智者太少了。近代以来，知识精英们发动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或者是孤芳自赏、响应寥寥，或者是昙花一现、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精英们在履行启蒙使命的同时，忽略甚至刻意掩盖了自身的缺陷，降低了对自我的要求。例如，康有为曾指出，人民愚昧、民智未开，高呼“开民智”、“伸民权”，但本身又保皇立宪，沦为封建主义的卫道士，变法失败后，也没有吸取教训、与时俱进，反而成了革命大潮的绊脚石。陈独秀也曾经宣扬要以自己的“先知先觉”来启迪民众的“最后之觉悟”，但忽视了自身的理论修养，提出“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点马克思革命的活动”^{[8]178}，为后来“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埋下隐患，不但没有启迪民众的觉醒，反而压制了民众的热情。可见，知识精英们虽然具有自身的优势，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文化精英自身的启蒙同样是非常迫切而且也是极其关键的。后来张申府也曾

意识到知识精英们“实在应该自省、自我检讨，自我清算”^{[9]720}，但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精英们没有也不可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知识精英们的自我启蒙远未完成。在自救与拯救的不和谐变奏中，精英们的呐喊很难获得民众的共鸣。正如德国哲人费希特所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10]45}

(三) 大众化的挑战

在启蒙心态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精英们曾较早地审视了民众，看到了民众的弊端。梁启超曾将其概括为四点：“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这些“乃吾中国人根本之缺点”^{[11]1187}。已经意识到“化民众”的紧迫性。为了完成“化大众”的神圣使命，必须走出自我的狭小圈子，在民众中寻找自己思想的支持者，与民众拉近距离。这无疑为精英与民众的互动预示着新的契机。但是，后来形势的变化却把这一契机推向了反面：“化大众”变成了“大众化”。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动员民众，人们普遍贬低知识精英，极力把民众理想化，甚至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革命的领导者并非工人，也非农民，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追求队伍的“纯化”，以工农大众取代知识分子。于是，“反智主义”趁机抬头。这一倾向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得到进一步强化。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必须重视民众身上所蕴藏的巨大动力，充分激发民众的全部热情，使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但同时又降低了知识阶层的价值。“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较，就会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12]851}并且，把是否大众化作为评判知识阶层革命与反革命的唯一尺度。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精英们为了避免被打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烙印，不得不融入工农之中寻求自己的立命之地。知识精英们在“到农村去”、“彻底大众化”、“永远成为农民”的一片喧嚣声中，彻底丧失了自信和独立精神。

(四) 终极关怀的困惑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知识精英一直以“道统”自居，不断追求自我超越，构筑终极理想。近代以来，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民生主

义”等等一定程度上都表现出了理想主义的倾向，即使在五四时代，这种倾向仍有增无减。五四时期，知识精英的憧憬是要建立一个“欲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的“理想王国”，这个“理想王国”就是平等和谐的大同社会：“若夫大同之世，无贫贱富贵之阶级，无竞争防御之忧患，而后利人类文明日益发达，可以作福全世。”^{[13]3}他们对这种完美社会理想的追求和向往主要是基于伦理道德层面之上，对知识精英们来说，社会大同之世的魅力是其平等和谐的道德价值。李大钊认为：“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14]16}当时的瞿秋白也认为，理想社会是以“绝对爱”的法则为基础的，“爱——绝对的爱——是无前际、无后际，人生的对象所以确定，人生的幸福所由流出的。这个爱是伟大的，普遍的，万能的心识”，“凡是能涵有培养绝对的爱之意义之社会制度，都是唯一的良好制度。”^{[15]67}知识精英们这种片面以伦理作为实现社会理想的基础，其实是以观念说明观念，以思潮解释思潮，无疑助长了好高骛远的乌托邦精神，使“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风靡一时。但对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民众来说这些“主义”却无疑是空中楼阁，即使暂时为其新奇所吸引，但终究会因缺乏世俗的根基而疏远。

三

总结过去，是为了开辟未来。新时期，现代化经济、政治的飞速发展知识精英的现代转型创造了良好契机。我们应当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与社会的和谐互动中，努力塑造体现时代特色的新型知识精英。这一角色定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多元文化的创建者

当今社会是个开放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建立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社会所具有的严格的等级秩序，形成了一套以普遍参与为特征的运行体系。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位一体的多元整合已成为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知识精英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主要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自觉遵循主流意识的导向。主流意识在当今中国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精髓的社会主义文化。它直接服务于政治，具有显明的意识形态性，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知识精英应该积极解读和传播主流意识，使之成为和谐文化体系的灵魂；(2)努力捍卫精英文化的价值。精英文化一般来源于现实，又超脱世俗，并赋予经典形式或者审美外

观,同时,批判社会弊端,倡导人文精神,引导时代潮流,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先锋。它的表现形态各式各样,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术文化。早在清朝末年,梁启超就提出了“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的见解^{[16]59},但是,当时的严峻局势决定了“经世致用”必然成为社会的主流,纯粹以学术为特色的精英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当今时代环境已经逐渐宽松的情况下,文化体系应该既鼓励应用文化的发展,也允许纯学术文化的生存。“为学问而学问”的真正意义就在于:遵循学术良心,排除外来干扰,捍卫真理权威。知识精英应该摆脱政治情结的纠葛,权势并不是精英价值的唯一体现,文化也不应该仅仅作为政治的手段,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只有手段真正升华为目的,知识精英才能找回应有的定位;(3)积极引领大众文化的发展。大众文化是指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文化。它一般采取非文本形式,灵活多样,覆盖广泛,有较强的适应力和旺盛的生命力,结束了以往文化被少数人垄断的历史,实现真正的文化革命。但目前大众文化也存在着诸如庸俗化、零散性等众多缺陷。知识精英应该在承认大众文化合理性的同时,积极发挥固有的批判精神,既汲取精华,又抨击糟粕,既尊重其价值,又摆正其方向,为文化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可见,各个文化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知识精英只有坚持主流意识的导向、精英文化的引领、大众文化的普及三者相互结合,才能在新文化的构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和谐关系的维系者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关系的维系,精英与民众的平等对话又是和谐关系得以维系的关键环节。作为平等的社会主体,精英与民众并非彼此消融、相互牵制,也不是互不相干、各自为政,而是在平等对话基础之上的和谐共进而又相对独立的关系。(1)精英应该化解“启蒙”心态,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民众。以往特有的文化背景塑造了精英特殊的历史权威。但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文明的提高,民众已不是封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而逐渐成为崇尚民主、自由、平等的新型主体。这种情况下,精英们如果再以“救世主”的姿态向民众“填鸭式”灌输其自以为神圣的教条,只能适得其反,甚至加剧民众的逆反心理。新时期“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来认识民众”^{[17]1},真正反映民众的心声,表达民众的意愿,引起社会的共鸣,从而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舆论导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2)民

众也不能消解精英。民众也不是万能的,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其巨大的威力也很难保证科学的方向。精英们应该以正义的精神去影响民众,以高尚的形象去引导民众,而不是直接融入民众,丧失了自身的独立价值。长期以来,知识精英们没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对社会的依附性较强,因此容易左右摇摆,甚至为政治所操纵。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是由于历史、文化以及精英的特点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就知识精英自身来说,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继续在文化构建和社会批判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谋求自己的独特地位。当前所倡导的“大众化”也应该明确界定为思想文化的大众化,而不能是精英本身的大众化。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18]102}可见,我们反对精英主义,但不能否认精英;反对民粹主义,但不能否认民众。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都会造成文明社会的分裂和对抗。

(三)创新机制的架构者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同样,创新也是知识精英的血脉,是精英永葆生机的源泉,缺乏了创新能力,知识精英就不可能游刃于社会舞台。要确保创新的持久动力,必须从知识精英自身的实际出发,架构相应的创新机制。(1)形成解放思想的长效机制。解放思想不是一时之举,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思想观念作为长期实践的产物,一旦固定化为人们头脑中的传统积淀,就会形成巨大的“惰性力”。受其影响,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总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最终达到实事求是的渐进过程。人们的自我改造虽然可以加速或延缓这一过程,但无论如何不可能使思想解放超越量的积累,而直接步入质的突变。同时,实践又是新观念产生、发展、确立的最终依据,那种脱离实践的所谓的“思想解放”,不过是从思想到思想、从观念到观念的纯粹意识领域的“造反”,这种“造反”曾被马克思主义批判为“面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在思想上的表现”^{[19]440}。但是只要符合客观实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就要大力提倡,这样的思想解放不存在“到头”或“过头”的问题。因此,知识精英应该拥有积极向上的心态,作好长期努力的准备,对新的实践、新的发展始终保持开放,

不断关注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在循序渐进中提升自身的修养,在潜移默化中赢得民众的拥戴,决不能再指望一两次政治运动“轰”出一个思想奇迹;(2)建立精英流动的竞争机制。竞争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特色,良好的竞争环境能激发创新的活力。对此,知识精英应该率先垂范,以竞争法则促进阶层流动,使每个成员都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20]新陈代谢是文明进步的必然规律,在竞争法则面前,任何意义的“象牙塔”都必然被摧垮,任何形式的独断都将会打破。知识精英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居安思危,积极进取,不断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素质能力,以开放的胸怀迎接各方的挑战,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竞争舞台。

参考文献:

[1] Viltredo Pareto. Viltredo Pareto Sociological Writings[M]. New York: F. A. Praeger,1966.
[2]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M]. New York:Harper Collins,1957.
[3] (美)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4] R·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6.

[5] 余英时. 内在超越之路[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6] 朱自清. 民众文学的讨论:四[J]. 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92-01-21.
[7] 普列汉诺夫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 北京:三联书店,1984.
[9] 蔡尚思.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10] (德)费希特. 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1] 梁启超全集:卷4[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 恽代英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4] 李大钊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6] 梁启超.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17] 顾颉刚. 1927年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发刊词[J]. 民俗,1927(1).
[18] 鲁迅全集:卷6[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0]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刘荣军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Elites in Harmonious Society

PANG Hu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however does not necessarily indicate that they are omnipotent. For a long time,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have been in the state of distortion because of their addiction to political complex,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and ultimate concern. In the new era,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should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ir role and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and the promotion of institution innovation, striving to realize their self-values in the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harmony;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role